

揭开日军细菌战的重重黑幕

——读哈里斯著《死亡工厂》

晓强

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博士，曾任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长期从事美国现代史研究，1991年退休，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他在1984年应邀来中国讲学期间了解到日本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的细菌人体实验，对这种残忍的严重犯罪以及对这种犯罪的掩盖，感到十分震惊。此后，经过10年的研究，尤其是在细致地查阅了美国档案、寻访当事人的基础上，撰写了《死亡工厂》一书，并于1994年出版。该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研究的是哈尔滨七三一部队、长春一〇〇部队、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等所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以及与日本天皇、皇族、军政高层的密切关系；后一部分集中揭示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真相。由于作者具有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和敏锐深刻的见解，使该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阅读该著，人们不仅了解日军细菌战的残酷，更使人们清楚了美日等国掩盖细菌战罪恶的层层黑幕。该著不仅是研究日军细菌战的经典之作，对于人们研究战后的国际政治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99年，该书日文版由日本柏书房出版，副标题是“被掩盖的七三一部队”。日文译者近藤昭二，是日本昭日电视台的资深记者，也是日本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著名专家，他于1997年制作了题为《消失在黑暗中的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电视片，同年8月16日播出，这是日本媒体首次报道日军细菌战，在日本

引起震动。近藤在译注中充实了大量的日方资料,使该著内容更为全面。

2000年,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副标题是“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文主要译者王选女士,是目前在日本进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团总代表,从1995年起参加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中文译本在原著的基础上,对照参考了日译本,在史实上更为准确。

一 细菌战与天皇及日本社会

哈里斯在著作中以详实的史料揭露了哈尔滨七三一部队、长春一〇〇部队和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等日军细菌战部队骇人听闻的人体细菌实验。哈尔滨七三一部队,又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石井四郎主持下,把数千名中国人(也包括一些俄罗斯人)以“特别输送”的名义送到七三一部队,以研究攻击性细菌战为主要目的,进行人体活体实验、解剖,这是20世纪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有关这一暴行,近年来研究揭露已较为充分。哈里斯总结了有关成果,并且还人们对知之不多的长春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主要进行动植物细菌战研究)和南京一六四四部队(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进行人体细菌实验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日本为什么要进行细菌战?哈里斯先介绍了细菌战魔头石井四郎。石井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已在日本陆军工作,并开始鼓吹细菌战。他列举了日本实行细菌战的理由,主要是日本这样能源短缺的国家,进行细菌战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威力巨大。哈里斯还提到了1942年12月15日,增田知贞以一个军医少佐和陆军军医学校讲师的身份,在东京对一群“科学家”做了一次题为《细菌战争》的演讲,认为细菌

战能够造成敌方的恐慌、影响敌人的士气,并迫使该国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去控制疾病、大幅度降低该国的战争能力。

细菌战是日本重要的军事战略,天皇与细菌战有直接的关系。哈里斯认为,其一,石井细菌战部队的经费得到了天皇的支持。1932年石井在背荫河组建细菌战部队之际,正是日本的经济大恐慌时期,但是石井依然能得到每年2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到1936年,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井事实上已掌握了1000万日元以上的年度预算,关东军虽以独立著称,但并没有独立的军费来源,因此,这笔钱只能来自中央的财政。而以后众多的细菌战部队的建立,至少要投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年度预算。以节约著称的天皇裕仁,不可能不知道这笔巨大的军事预算,天皇手中拥有一笔皇家秘密专款,就是用于研究特殊武器。

其二,多位皇族了解甚至参与了有关细菌战部队的建设工作。天皇的表弟竹田恒德,以宫田武中佐之名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管经费,并且负责审批细菌战部队的访问者。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与关东军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曾访问过平房细菌工厂。1939年2月9日,在东京的陆军省大会议室,裕仁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听取了石井的演讲。^①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亲王也参观过平房。

其三,细菌战部队是直接在天皇的命令下建立的,并一直得到天皇的特别关照。天皇裕仁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出兴趣,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各样的培养组织的研究”。石井部队和若松部队都是在1936年奉天皇敕令建立的。关东军军医部长隆二说1936年石井开始在平房的实验是天皇的命令,他曾在该命令“附有部队定员表的军令上盖

① 《石井军医大佐的讲演》,《时事片断》《军团杂志》311号,1939年。

了章”。此后,1939—1940年间天皇还就承认石井部队的再编又发布过军令,隆二在该军令上也盖过章。^①在裕仁统治期间,唯有这两支部队是直接由天皇敕令建立的,其他部队则是由陆军内各有关指挥官下令建立的。石井和长春一〇〇部队队长若松有次郎还在从事细菌战后得到过有天皇御印的高级勋章,这又是独一无二的“荣”。

哈里斯还分析了细菌战和日本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石井的细菌战研究及其人体实验,在军界、科学界、国会要员和皇族成员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了解这一秘密,并习以为常。石井公开地在军界和科学界多次演讲,宣扬他的攻击性细菌战计划,并不隐瞒使用人体细菌实验的事实。日本的大学几乎都被动员,除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外,还有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并有科研人员直接参与细菌战研究。这些细菌战研究者在日本主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战后这些细菌战研究者重新登上社会精英的位置。他们主宰了日本医学会(JMA)理事会,控制了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JNH),担任着日本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以及地方卫生局局长等重要职务,有的还在国际科学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在日本的许多大学,如东京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大阪市立医科大学、顺天堂大学等担任着教席。他们还是日本现在主要的医药企业的负责人,如绿十字公司、武田制药公司、早川医药公司和S·J有限公司等。一〇〇部队队长若松有次郎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七三一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是绿十字公司东京分公司负责人。绿十字公

^① 作者引用的是苏联伯力审判文献材料——《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

司则是由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内藤良一创立的。

哈里斯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日军细菌战罪行,是20世纪最邪恶的严重罪行,可怕的是,这种罪行不是个别魔头的个别行为,而是当政者的国家行为,并且还得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全面支持。哈里斯分析说,日本人所以会进行这样的罪行,是因为他们基于这样的观念:认为“天皇是现世之神,且日本国民优越于他民族国民,而命定将支配世界”。根据这种观念,石井等毫无顾忌地进行着细菌战的人体实验,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受害者是劣等民族,是为一个更高的事业而被牺牲的。更可怕的是,由于罪恶没有清算,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在本社会中存在。

二 日本对细菌战的掩盖

哈里斯该著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清楚地描述了日本政府和细菌战犯们在与美方调查人员周旋过程中对细菌战罪行的竭力掩盖。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那些重要的日本官员都以不知道来否认细菌战的事实;石井先是诈死,在接受美军调查时,竭力否认从事过大规模的进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对人体细菌实验更是讳莫如深;所有接受调查的人都把天皇描绘成人道主义者,咬定天皇不知道细菌战之事。这里我想引用该著日文译者近藤昭二的调查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揭示日本对细菌战的掩盖。2001年2月5日,近藤以研究者的身份,在东京地方法院“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案”第20次听证会上作证(甲第106号证),揭露了日本政府以国家的意志掩盖细菌战的事实。

维持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体是败战后日本政府的首要工作。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了原子弹,苏军也进入中

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日本政府举行御前会议,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日本政府又以维持天皇制度为最基本的前题。10日,日本政府通告,在明确不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要求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宣言》。对此,美国国务卿班斯答复说,在日本投降以后,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的统治权从属于盟军最高官,日本终极政治形态应该根据日本国民的意志决定。

为此,首先要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投降以后,9月18日日 本首相东久迩稔彦会见外国记者,记者的提问集中在天皇的战争责任和虐待战俘问题。对此,日本内阁9月21日,向各部局发出了《会见外国记者后注意事项》的通报;于10月3日,发出了《有关战争责任应对要领》的指示;于11月5日作出了《有关战争责任等问题的要件》。^① 上述文件,旨在统一口径,开脱天皇的战争责任,其要强调的主要的内容是天皇不知道军队的事,参谋本部并不向天皇报告。

日军细菌战事实更是必须要绝对掩盖。由于七三一部队是直接根据天皇的命令建立的,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和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惨无人道、并严重违反国际法,日军细菌战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所以,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之际,日军参谋总部就立即指示七三一部队毁灭证据。参谋总部作战课参谋朝枝繁春中佐在8月9日得知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的消息,就立即考虑到“七三一部队若落入苏军之手,真相大白于天下,必然发生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② 翌日,朝枝立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打电话给七三一部队,向石井四郎传达命令,要毁灭七三一部队的证据,并首先派飞机将53个博士

① 见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2》,大月书店 1980 年版,第 340—342 页。

② 朝枝繁春:《追忆》,1997 年私家印刷,第 12 页。

级的医生撤到东京。朝枝还受参谋总部的派遣,故意被苏军抓住。因为在苏军进入东北之际,七三一部队人员虽然已全部回国,但是,一些曾在七三一部队工作过后又调到其他部门的人员被苏军俘虏,朝枝繁春就是为了向被俘的有关人员封口,以保守细菌战的秘密。近藤对朝枝进行了采访,并且向法庭提交了有他签名的证词。

8月15日上午8时半,在日本政府播出天皇“终战”诏书前夕,陆军省也再向七三一部队发出了毁灭证据的指示。陆军省负责日本陆军技术(包括特殊兵器在内)研究的军事课员新妻清一中佐,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后,感到要尽快处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等问题^①,立即致电关东军,指示毁灭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等有关细菌战全部证据,随后还写了题为《特殊研究处理要纲》的备忘录。^②当天,陆军省举行了会议,阿南惟畿陆军大臣发出了烧毁一切不便让盟军知道的文件指示。

事实上,七三一部队从8月10日就开始进行毁灭证据和撤退人员的工作。该工作包括:杀害所有作细菌实验用的“木头”——主要是被监禁的中国人,也包括一些苏联等国人,约405人^③;派兵炸毁建筑、设施;全部七三一部队成员优先坐军列撤离;为彻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际,石井四郎要队员们随时带着氰化物;在长春火车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队员们在复员后,要严守秘密,队员不得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此外,还用氰化物毒毙了约40名被细菌感染的队员。^④

① 共同通信社记者太田昌克对新妻的采访,《共同通信社配信记事》,1994年7月4日。

② 该备忘录现存于新妻的遗属手里。

③ 日本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晚声社1996年版。

④ 《〈恶魔饱食〉的护士证词》,《妇人公论》1982年11月号,第280页。

1945年9月，美军派莫瑞·桑德斯中校到日本调查细菌战。日本对此统一了两点口径：一是要否认人体细菌实验，二是要否认攻击性的细菌战。桑德斯调查没有了解到这两方面的情况。1946年1月，美军又派阿沃·汤普生中校到日本调查，这时美军找到了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北野当时在中国被俘，因调查需要送回日本。日本陆军与北野等再次统一口径，绝口不说人体实验和攻击性细菌战的事实。该文件也已发现，从文件上看印了80份，可能发给了80人或部门以统一口径。^①汤普生见到了石井。石井女儿说当时参谋本部派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直接指挥石井，由石井女儿在隔壁将审讯情况打字送给服部，服部根据审讯情况给石井下指示。^②所以汤普生也没有了解到人体实验和攻击性细菌战的情况。

此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战犯作了交易，美日共同掩盖有关事实，阻挠苏方对石井等人的审讯。1949年12月，苏联在哈巴罗斯库对12名日军细菌战犯人进行了审判，并向全世界作了宣传。1950年3月1日，日共议员听涛克已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就此提出质问，殖田俊吉国务大臣回答说，关于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东京审判已经解决，关于细菌战犯罪问题，我想这与政府无关。政府也没必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把天皇作为战犯，这是日本政府绝对反对的。提这样的问题有违日本人民的愿望。

1982年4月6日，利夫议员在参议院的内阁委员会提出了七三一部队的战犯免责问题，政府的回答是没有相关的记录。^③1997年12月17日栗原君子议员就美国陆军档案局长所言有关

① 太田昌克：《七三一免责的系谱》，日本评论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② 1987年4月27日对石井春海的采访录音。

③ 第七届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6号，1950年3月1日国会议事录。

七三一部队的资料已装箱运回日本提出问题,防卫厅防卫局长佐藤回答说,防卫厅确实收到过美国返还的前陆军的资料,约有4万件,保存在防卫研究所,所谓七三一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没有资料显示该部队与细菌战的关联。^①1999年2月18日田中甲议员再次提出这一问题,野吕田防卫厅长的回答是没有可以确认的史料。

近藤在证词最后指出:“本来,日本政府在接受《波茨坦宣言》之际,应该象宣言所期望的,在日本国民中恢复和强化民主倾向,有义务向国民和国际社会坦白非人道的罪行。日本政府非但没这么做,而且至今仍在隐瞒事实,为此,拒绝救济被害者以及有关人员,甚至歪曲历史对他们的后人造成新的伤害。”

三 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罪犯的交易

哈里斯在第十三章题记中引用了一段话:“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名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战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阴谋……”东京审判为什么要掩盖日军的细菌战,又是怎样掩盖日军细菌战的,哈里斯在该著中着重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掩盖日军细菌战罪行与美国正在进行的细菌战研究有关。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开始于1941年,1942年11月该研究由美国陆军化学战部实行。到1943年初,化学战部选定位于马里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为细菌战研究基地。此后还建立了在密执安州的角岛、犹他州的花岗岩峰野外实验场和印地安那州的维果细菌

① 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号,1997年12月17日国会议事录。

制造工厂。人员最多时达 3900 人。

美国在研究过程中十分关注日军的细菌战情报。1939 以后，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就有较多报道，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重视。1942 年 8 月号的《洛基山脉医学杂志》登载了题为《日本人把中国人当作实验豚鼠做细菌战试验》的文章，评述了中国卫生部长金宝善有关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 13 页报告，该报告指出自 1940 年到 1942 年，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已有 5 次，由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作了完整的记录并确证。1943 年，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情报部门在日俘中进行了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细菌战的信息。到 1944 年秋，美国已了解日本细菌武器开发研究的许多情况。1945 年 6 月，美军逮捕并审讯了原日本驻德使馆科学参赞北条圆了大佐，由于北条曾在平房工作过，了解日军细菌战的核心机密，北条供述了除人体实验外的广泛而详细的情报。在此期间，为保守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研究，美国政府十分小心地封锁一切有关日本细菌战的消息。

美军占领日本后，没有把细菌战犯列入审判调查范围。1945 年 8 月，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并组织了远东国际法庭，以对战犯进行审判。当时的东京军事情报部和战争犯罪指控部至少收到了数十份涉及到日军细菌实验的控告信，特别是针对石井、若松和整个细菌战医学研究机构的指控相当准确。如日本共产党于 1945 年 12 月 14 日提交的备忘录，披露了关东军石井细菌部队的活动内容。有一位叫今二节的，揭露石井进行人体实验，并对石井的背景十分熟悉。1946 年 2 月 10 日和 8 月 23 日，原一〇〇部队的纪野猛和西村武给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写信，指控若松等解剖了很多盟军战俘。1946 年 1 月 6 日，《太平洋星条旗报》和《纽约时报》登载了有关消息。当局立即阻止了新闻媒体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检察官美国人莫罗上校根据《太平

洋星条旗报》等材料,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去中国搜集证据,4月,当他把材料交给首席检察官基南后,就奉调回国,此事也不了了之。

美军情报和细菌战研究部门却十分关注传闻先进的细菌武器,多次派员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1945年8月,在美国陆军部要求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率科学调查团赴日调查,底特里克营也于9月派莫瑞·桑德斯中校前来调查。1946年1月,石井被美方发现,底特里克营又立即派阿沃·汤普森前往东京讯问石井。1947年4月底特里克营又派实验计划部主任罗伯特·弗尔前来调查,弗尔认为日本人用人体所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并明确地向石井等细菌战犯们许诺,“调查只是为了取得科学的和技术的资料,与战争犯罪无关”,从而获取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47年10月,底特里克营再派基础科学部部长爱德华·希尔和病理学家约瑟夫·维克特到东京调查,他们在取得更多的成果后,在报告中写到:“希望自愿提供这些情报的个人,因提供这些情报而免遭麻烦。”

美国获得和将要获得的资料包括由19名细菌战犯提交的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8000张细菌实验人体及动物解剖组织幻灯片,10名兽医的研究总结和20页19年来植物毁灭研究报告,石井撰写的20年来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各阶段经验总结。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分析后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并不比美国先进,情报并非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其中的细菌人体实验,显示了细菌武器病原菌对人体的直接效果。而美国目前为止细菌武器的病原菌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需要从动物实验获得的数据来推算,其结果是非确切性的,远非完整的。希尔说:“新得到的有关人体接种特定量的传染病菌后,对这些疾病的感应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在我们的实验室是无法得到的。到手这些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九牛一

毛。”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有关讨论中多次提到。也就是说,正因为日军细菌战犯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细菌人体实验,因此就有了免除战争责任的可能。

美国为了获得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而决心掩盖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费尔的许诺,决不可能是个人行为。哈里斯提到了1947年6月24日费尔在一封加急电报中,记录了在前一天,美国化学战部队司令艾尔登·怀特少将与陆军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的代表在华盛顿的会议,会议“非正式地”同意接受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以及化学战部队司令怀特的提议,即细菌战调查资料将保留在军事情报系统,不用于战争犯罪起诉。这项决定将通知在东京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小委员会。当时在华盛顿,由上述三部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对日占领政策,在东京的三部协调小委员会向他们汇报工作并提出建议,联合参谋总部为传达机构。根据美国政治状况,关于日本细菌战犯免于战争犯罪起诉的决定,最终应该是华盛顿最高行政当局,而不是底特里克营、东京的占领军司令部或五角大楼作出的。

哈里斯查阅了东京三部协调小委员会讨论有关日军细菌战犯免责的档案材料。主张免除日军细菌战犯战争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日军细菌战研究成果、尤其是细菌人体实验的成果具有重要价值,只有许诺免除战争责任,才能得到这些成果,这个交易对美国是有利的。“化学战部队及情报部都认为从日本人提供的或将要提供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二是一旦提交司法审判,细菌战研究秘密就难以保守,美军细菌战研究的秘密和技术也有暴露的可能。小委员会中唯一的争论,是这场交易是否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问题。小委员会提到了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判决,“这个机构现在正在纽伦堡起诉主要的德国‘科学家’和医生们的犯罪行为,包括引起被实验

者极度痛苦的人体实验”。小委员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应付苏联的调查,其策略是,把焦点放在日本细菌战对中国人的残虐行为,不得提及对苏联公民的可能的虐待,“因为对于日军对中国人的犯罪行为,苏联人没有追究战争犯罪的明确权利”。美国陆军法律顾问还为小委员会提供法律上的理由,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盟国将对石井及其同伙进行战争犯罪起诉。”

细菌战主要受害国中国的沉默态度,使美国与日本的交易顺利进行。哈里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一直向全世界发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警告,但奇怪的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细菌战犯几乎没有关注之意。中国政府在东京军事法庭的法官以强硬著称,并且知道日军细菌战罪行^①,但从未在审判中提出细菌战犯罪问题,中国卫生部长金宝善则被冠以“听话的斑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听从了美国人的安排,并“肯定曾希望对他们的沉默会有某种方式的补偿”。^②直至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蒙古一起,才针对日本实施细菌战,要求追诉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美国与日本战犯的交易行为,暴露了美国在价值观上利益至上的虚伪和实用态度。哈里斯指出,当时没有人打算对负责与日本人进行细菌战交易的人提伦理、道德、传统西方的或犹太及基督教的人的价值的价值的问题。从1945年11月份桑德斯的报告到1948年3月的联合参谋总部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以及所有的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看,影响日本及美国科学家们的伦理问题没有一次进

① 当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助手的美国人戴维德·色顿在法庭陈述中曾提到细菌人体实验问题,致使法庭休庭,随后该问题没再提起。见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与两名自杀的医学者》,新潮社1982年版,第187页。

② 彼得等著:《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纽约帕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页。

入过讨论,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说过细菌战人体实验的令人憎恶,应予以起诉。唯一关心的是交易一旦公开,将给美国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所以,当人们不断地揭露这场肮脏的交易,美国官方渠道还继续隐瞒真相。1976年陆军办公室历史学家哥尔德伯格在回答一位美籍华裔的询问时,说“华盛顿没有准许参与细菌战的日本人免于战争犯罪起诉”;10年后,美陆军档案局长约翰·哈切否认军队拥有任何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档案文献。

哈里斯认为,由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的交易行为,东京远东军事法庭没有对此罪行进行审判,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日本,战争罪犯象自由人一样自在,他们重新登上战前社会精英的位置,培育着新的一代研究者,同时向人们反复灌输引导着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整个国家被笼罩在集体遗忘之中,并推动着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在美国,一些与此有关的科学家及其后继者也因此而堕落,产生了科学结果比病人安全更重要的信条,在战后出现过成百上千例非自愿的人体实验;在中国,人民则仍然在受害,死者的尊严得不到维护,遗属的精神得不到慰藉,幸存者的创痛仍在继续,疫病的隐患仍然存在。

四 日本细菌实战的严重罪恶

除细菌人体实验以外,日军还直接在实战中试验和应用细菌战。日军细菌战的实战试验和应用,其残酷不亚于细菌人体实验。瘟疫的爆发,受害人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个别幸存者也痛苦终生;烈性传染的恐惧笼罩整个社会,疫区在绝望中被社会隔绝;疫源地的长期存在,环境的破坏,甚至危害到今天的生活。至于危害规模范围更大大甚于细菌人体实验。还要强调的是,日军细菌

战是直接以平民为主要目标的。^①所以,攻击性细菌战的试验和应用,是日军细菌战战争犯罪中最严重的罪行,以至细菌战犯在与美国调查员接触中也尽量回避这一问题。

哈里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军细菌实战试验。他引用了1937、1938、1939年间傅作义、韩德勤、卫立煌等给蒋介石的有关电报,说明日军可能已经进行了细菌实战试验。他具体描述了1939年日军在与苏军冲突的诺门罕战役中使用了细菌武器,此后到1940年在东北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试验作战,从1940—1942年在宁波、衢州、金华和常德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试验作战。他认为,石井等对美国调查员所说的只进行过12次细菌试验作战,数字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细菌试验作战中死伤人数至少已达6位数。

关于日军攻击性细菌战的试验和应用,由于日军细菌战犯的掩盖、资料的欠缺,哈里斯的研究在现在看来还不充分,而且他认为日军还局限于细菌试验作战阶段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以往关于日军攻击性细菌战的试验和应用的研究,主要根据1950年公布的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1989年中国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②一书,根据中国审判档案和中国军政部门的档案材料,充实了相关内容;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原日军参谋总部具体协调细菌作战的作战课员井本熊男大佐的工作日记,其中记载了1940年至1942年对中国进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细菌作战;尤其是1996年

① 根据1940年9月起担任日军参谋总部具体协调细菌作战的作战课员井本熊男大佐的工作日记,日军细菌战是直接以平民为目标的,如1942年7月15日日记载,当时决定在中国民众住地撒布细菌,待日军撤退后,使返回的避难民众感染细菌,以造成疫病流行。

②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

以后，中国浙江义乌、丽水、衢州、宁波，湖南常德，云南保山等受害地区的民众调查，使我们对日军对华细菌战试验和应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得知其危害的严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如前所述，细菌战是日军重要的战略安排。日军在中国境内有5支重要的细菌战部队，分别是驻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驻长春的一〇〇部队、驻北京的甲一八五五部队、驻南京的荣一六四四部队和驻广州的波八六〇四部队，此外还有在新加坡的冈九四〇二部队等。这些部队又称防疫给水部，还在各军设立防疫给水支部，在各师团设防疫给水班。

1939年诺门罕战役后，日军开始相当规模的细菌战试验。除东北外，在江、浙、沪，日军在南京设立荣一六四四部队的同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该区域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①1940年8月，日军七三一部队和荣字一六四四部队根据日军参谋总部、陆军省关于在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的决定，联合组成了细菌战行动部队——“奈良部队”，以杭州笕桥的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为基地，对浙江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井本日记记载：这次攻击的目标有宁波、衢州、金华、玉山、温州、台州、丽水，到10月7日为止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衢

^① 如顾祝同于1939年7月10日致蒋介石电文：敌派细菌、化学部队万余人到沪，拟编入日军各师团及其联队，以进行细菌战。

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①，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宁波城区开明街一带爆发鼠疫，虽立即进行了防疫工作，但仍造成106人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明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温州等地可能是空投了霍乱菌，被认为效果不明显。但是，除井本日记所载的飞机空投外，“奈良部队”还多次乘车外出，在河流和水井中撒布细菌。^②

1941年，日军对常德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显然已把细菌战作为重要的战争手段投入使用。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是为了策应日军第十一军将在12月份发动的第三次攻打长沙战役。常德以粮仓著称，又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于是，这年10月，石井四郎亲率七三一部队远征队来到华中，再次与一六四四部队联合实施细菌战。11月4日晨，一六四四部队部队长大田澄直接指挥日机在常德投撒36公斤鼠疫疫蚤，造成了1941至1942年常德及周围地区的鼠疫流行。当时在医院和隔离所的死亡人数约数百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9年的调查材料，在城内有姓名可查的受害死亡人数有4000余人，军人还不在此内，其中一个兵站的新兵至少千人以上在这次鼠疫流行中遇难。

1942年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等进犯滇西，并实施了细菌战。5月4日，日军对云南保山投放了大量细菌弹，造成霍乱流行，仅保山城死亡就达6万余人，滇西数十县死者当以数十万计。^③

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则把细菌攻击也作为重要的战术

① 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② 郡司阳子：《细菌战部队真相》，德间书店1982年出版。

③ 陈祖：《侵华日军滇西细菌战实录》，《观察与思考》1999年第5期。

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已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6、7月间,荣字一六四四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面积的疫病流行,据当时浙江卫生处的报告,霍乱蔓延到浙东、浙南、浙西等近20个县。^①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②中国平民的伤亡更难以计数。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七三一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十三军参与浙赣战役。为避免日军被细菌感染,石井与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份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

① 《1942年度浙江省卫生处第一科工作报告》,浙江档案馆,36-0-86。

② 据原日军荣字一六四四部队九江支部队员榛叶修1946年在南京法庭的证言——《日军罪孽证明书》,载《细菌战与化学战》;又见美军审讯日军战俘的有关报告,《目标石井》,大同书店1984年出版。

述菌种外,据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称,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公斤的炭疽菌。^①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疟疾、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4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左右。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的死亡人员有2252人。^②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③金华则出现了炭疽流行。

1943年9月、10月日军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在鲁西的“霍乱作战”。由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甲一八五五部队)指导,以下各军叫给水支部,各师团设给水班。在馆陶、南馆陶、临清、堂邑等地,通过卫河决堤进行。该地区因水灾和霍乱死亡至少数万人。^④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独力承担。这时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记载,荣字一六四四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

①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

② 根据丽水县日军细菌战调查委员会1999年11月的调查报告,丽水当时是浙江省的临时省会,大批机构、军队和难民云集于此,死亡人员已难以计数。

③ 根据义乌市日军细菌战调查会1999年11月的调查材料。

④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08—339页。关于日军鲁西霍乱作战和民众受害的情况还可参见本多胜一、长沼节夫著《天皇的军队》第10章“1943年秋鲁西作战——霍乱作战”,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只鼠，月产量可达 15 公斤。1944 年，日军再次发动浙赣战役，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在战争中积极实施细菌战，使浙江的疫病流行达到又一个高峰。日军在这次战役中进犯浙南，温州地区也出现了鼠疫和霍乱的大流行。

日军攻击性的细菌战的试验和应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我们从 1942 年浙赣战役时期日军第十三军人员损失表上可见，该军战死 1284 人，战伤 2767 人，而战病达 11812 人，战病是战死的 9 倍，在细菌战大规模实施的 8、9 月份，战病则是战死的 61 倍之多。^① 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的严重程度，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更是不堪设想。目前的调查还只在初步阶段，还只停留在几个区域和以鼠疫为主的个别菌种上，动植物细菌战还没有涉及，随着调查的深入，其严重性将会越来越清楚。

哈里斯先生以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用了 10 年的时间，深入研究了日军细菌战罪行以及美国对这一罪行的掩盖，尤其是查阅了大量的美国档案，使该研究严谨而且细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并给我们观察战后国际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由于美日对此罪恶的掩盖，历史已过去了大半世纪，揭开重重黑幕，需要我们艰苦不懈的努力。重视民族的苦难史，维护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点。所以研究并揭示这一历史的真相，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丁晓强，1960 年生，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室编：《昭和十七、八年的支那派遣军》，朝云出版社，第 264 页。